

1

作者访谈

- ☆ 福利经济学的真义 (杨小凯)
- ☆ 经济数理化趋势显著 (杨小凯)
- ☆ 引用次数与发表文章的‘诀窍’ (杨小凯)
- ☆ 改善‘发表效率’的方法 (杨小凯)
- ☆ 寻求经济学的新突破 (黄惠元)
- ☆ 黄有光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左大培)

福利经济学的真义

黄有光教授谈经济学理论与研究（一）

【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石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黄有光教授在美国经济学会 1992 年年会上筹组一个以他的“综观经济理论”为题的专题讨论会。杨小凯利用同事之便，访问了黄教授，请他谈一谈他的经济研究，希望这篇采访有助于读者了解黄教授的主要经济理论及研究方法。

◎杨小凯 ●黄有光

◎你不仅是 5 位居住在澳大利亚、名列经济学家名人录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惟一的华裔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入选有什么条件，你是什么时候被选为院士的？

●我是在 1980 年被选人、1981 年正式成为院士的。我曾听人说过，院士相当于中国学部委员的。但我对中国学部委员的情形不甚了解。不过，我想中国人口那么多，又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要成为学部委员，应该比这里的院士还要困难。中国台湾也有“中央研

究院 院士的制度 大概性质相似。

当选院士需提名通过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虽然也做一些鼓励社会科学研究(诸如出书、办演讲会等)与外国类似组织交往之类的活动,但其主要任务是选院士。人选为院士,纯粹是一种荣誉,没有钱拿,也没有什么义务或职责,除非接受担任院中的行政职务。与前苏联的情形不同,澳大利亚与英美都是由大学进行主要的研究,而不是由科学院进行。

新的院士由旧院士提名、审查与投票通过。没有明确的入选条件,但一般要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虽然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院里只有我是惟一华裔院士,但我相信,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才不外流的话,不久应当会有超过一名的华裔院士。

社会科学院的活动之一,是与中国的社会科学院进行交换学者。我也曾通过这项计划到中国访问一个月。在这项计划下进行访问,并不需要是院士,凡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或访问中国有利于其研究的学者,都可申请,尤其是会讲华语,不需要翻译人员的学者,会优先获得考虑。

◎如果读者希望了解你的主要经济学术观点,你愿意告诉他们什么?

◎我愿意谈谈三方面的观点——综观经济分析、第三优理论及社会选择理论。

综观经济学是我近十年来提出的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它采用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分析的要点，综合而成。集中分析一个代表性企业（可代表一个行业或代表整个经济），而又顾及其他企业、消费者与生产要素供应者对这个代表性企业的影响，还顾及宏观变量（如总需求、总产量、平均物价）对这个代表性企业的影响。

综观分析法的优点

综观分析比全面均衡较易于运用，能得出许多比较静态结论，可以用于分析整体经济或整个行业的某种外生变化（如成本、总需求、预期等变化）对平均价格与总产量的影响。比起传统的宏观分析，综观的微观基础在分析方法中就已具备，不必担心是否符合微观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其次，综观分析不必采用企业是一个完全竞争者这个很不符合经济事实的假设。

在结论上，综观分析可得出一般结论，说明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都是一种特例，在某种经济情况下才能成立。而且，如果在综观分析中采用完全竞争的假设，则可得出货币学派的结论，而货币学派就是假定完全竞争的。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不但有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结论，也可能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更有一种“预期神地（Expectation wonderland）”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若厂商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使价格增加而产量不变，则价格真地会增加而产量不变；若厂商预期产量增加而价格不变，则也真地会实现。

理论渐受重视

◎这是很有意思的理论，希望能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前剑桥大学教授 Robin Marris 认为我于 1980 年在英国《经济学期刊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是给宏观经济提供不完全竞争的微观基础的现代先驱^①。其次，美国的《经济文献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与英国的《经济学报 Economica)》对我 1986 年的《综观经济学 (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 Analysis)》一书的书评都是正面的。将于 1992 年 1 月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最近接受我组织的一组讨论会题为“综观经济学及其应用”其中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我用综观经济学分析商家信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章，是有关经济大萧条的产生与如何避免的问题。第二篇是我与博士生史鹤凌合作“把综观经济学与‘可计算全面均衡’结合”的文章。第三篇的作者是 Abayasiri-Silva，他把综观经济推广至有国际贸易的情形，并比较综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对总供给线的不同结论。

◎接下来请你介绍第三优理论。

◎根据基本福利经济学，要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①见 Robin Marris, “Reconstructing Keynesian Economics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Edward Elgar, 1991

必须在经济体系所有部门满足边际替代率 MRS 等于边际转换率 MRT 。但因垄断、外部性和税收等问题，使某些部门的 MRS 不等于 MRT 。给定这些附加约束，次优理论的结论包括：1. 每对产品一般都不应遵守 $MRS = MRT$ 的最优条件；2. 新的次优条件复杂无比；3. 一个满足更多最优条件的经济，不一定比满足较少的最优条件的经济有效，除非前者满足全部最优条件。

要在所有部门满足 $MRS = MRT$ 是不可能的。由于上述第三点结论，要进行局部改进也无所适从；再者，由于信息不足与行政成本太高，要满足次优条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次优理论给经济学的适用性带来重大冲击。然而，许多学者企图缓和次优理论的提议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提出第三优理论，尝试全面解答次优问题的挑战，并挽救福利经济学。

第三优理论证明，在信息贫乏的情形下，采用最优法则是最佳选择，至少在预期值上可以成立。因此，现实经济中，尽管有许多扭曲，福利经济学还是能给我们以有用的指导^①。

一元等于一元？

在 1984 年，我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中把第三优理论应用到收入的分配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不论是穷人或富人，一元等于一元。这个结论看来很违反常理，只能是极右分子无视穷人疾苦的极端偏见。但

^① 详见《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文版，台湾茂昌图书有限公司，1999 年。

你若耐心听我解释，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在我刚写完《第三优理论》后，我与莫纳石大学经济系 Parish 教授共进午餐。他对我说：“有许多经济学家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采用收入加权法，把穷人的一元当做二元计算，富人的一元当半元计算。我反对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不论穷人或富人，一元就是一元！”

我答说：“同样一元钱，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比富人大。这种加权法不见得不对！我们各持己见，争论了一小段时间，都没有说服对方。”

之后，我用比较严密的经济分析方法，企图证明 Parish 的观点错误。结论可参见刚才提到的刊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证明一元就是一元（顺便一提，此文被至少三四家期刊退稿，经过 8 年时间才发表，不过有不少修改。因此，此文的结论完全是受逻辑推论所决定，并不是受右派或反穷人的思想影响。

其实，一般人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左派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很合理，但若进一步研究其间接效果，从全面与长期来看，往往就会变成很坏的东西。

虽然我们要设法帮助穷人（至少那些不是咎由自取的穷人），但与其用收入加权、补贴食品等反效益的平等措施，不如取消这些措施，而多征富人的税，并增加对穷人的补贴。这样能使富人与穷人都得利，而政府净税收维持不变。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上述增加所得税累进率的办法，会降低人们的激励，从而降低产量。不错，增加所得税累进率本身，是有降低激励的负作用。但是在成本效益分析中采用收入加权等反效益平等措施，也一

样对富人不利而有降低激励的作用。这些措施且有其额外的反效益扭曲，因而比累进所得税更糟。

◎这个结论对实际经济政策有很重要的含义，希望当政者会考虑你的理论，现在请你谈谈社会选择理论。

对传统观点的突破

◎这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有关阿罗 (Arrow) 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的不可能性定理。阿罗证明，若社会选择只根据个人的序数偏好 (Ordinal preferences) 即对候选方案 (Alternatives) 只有排序 (Ordering) 而没有偏好强弱的资料，如果又要符合一些非常基本的合理条件，则是不可能办到的。

里特 (Little) 与萨缪尔森 (Samuelson) 认为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并不适用于福利经济学 因为福利经济学中所用的社会福利函数 只根据给定的个人偏好 而阿罗定理只有在考虑个人偏好改变的情形下才能证明。我和 Murray Kemp 教授 1976 年 2 月在英国《经济学报 (Economica)》上的文章证明，即使给定个人偏好不变，社会选择若只根据个人的序数偏好，依然不能办到。同年 10 月 Parks 教授在《经济研究评论》上也得出类似的 不可能性定理，但其所用条件与我和 Kemp 所用的略有不同，证明方法也各异。Kemp-Ng-Parks 不可能性定理出现后 很快被推广 从 1976 年至 1980 年中有许多文章，把我们的定理推广到许多领域上。

我虽然证明了不可能性定理，但我在社会选择上

的看法是正面的。我认为，阿罗与我们的不可能性定理显示 社会选择应该不单单依据个人的序数偏好 也要依据个人偏好的强度大小(Intensities of preferences)，这就是我第二方面的研究。

个人偏好的灵敏度

我 1975 年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文章 论述可以根据个人偏好灵敏度有限的道理，得出能够进行人际比较的效用函数，并进一步证明，在一些合理条件下，社会福利是社会中所有人的个人福利的总和。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没有人偏好 Y 而至少有半数的人偏好 X 则社会福利在 X 时比在 Y 时更高”。

个人偏好灵敏度有限的道理，可用一个例子说明。例如你喜好在一杯咖啡中放两茶匙糖；两匙比一匙好。但若是两匙比 1.99 匙，则你大概就分辨不出上下了。因此，我们可以用最低可感知的快乐，作为人际可比的福利单位。

这个道理，经济学名家 Edgeworth 在 1881 年就已提出。他把这个道理当做是不能证明的基本公理；我则用几个更基本的公理，证明上述道理是合理的结论。Borda 在 1781 年也有一些较模糊的提法。因此，当我于 1974 年在牛津大学 Nuffield 学院，在这个问题的研讨会上演讲时，有一位博士生说：“你为什么不能多等几年到 1981 年再提出你的论点呢？”我答说 等到我的文章发表时，可能已经是 1981 年了。不过 研讨会主持人 James Mirrlees 教授很喜欢我的论点，他当时是《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就向我建议把文章给这家期

刊发表。经过审稿与修改后，在次年（1975）就发表了。

论文备受行家赞赏

我在牛津参加研讨会后，也把大纲寄给当时还在哈佛大学的阿罗教授。他回信请我到哈佛参加研讨会，我顺道也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研讨会。在哥伦比亚时，研讨会的参加者中有名教授 William Vickrey。他从头到尾一直问许多问题，研讨会后，当大家共进晚餐时，Kevin Lancaster 教授对我说：“Vickrey 在研讨会中没有睡觉，等于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Pay you a great tribute）。原来 Vickrey 在研讨会中经常睡觉，等主讲人讲完才醒来问一两个问题，又经常提前离开。

多年后，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中遇到 Chew Soo Hong。他当时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任助理教授职。他对我说，读博士时 Vickrey 教福利经济学，用我的书，并在班上对学生说，这是福利经济学中最好的一本书。这种间接传来的赏识，是金钱买不到的极大奖励。

我还有多篇论述效用或福利强度的重要性、序数偏好不足性的文章。我对社会选择方面的探讨结论，可参阅美国马里兰大学 Dennis Mueller 教授撰写的《公共选择（第二版（Public Choice II））》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 章与第 22 章对我的观点的介绍。此书对萨缪尔森与我和 Kemp 的争论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Mueller 教授在此书第一版（1979）出版前，把评论此论争的一章寄给萨缪尔森，他看后很不满，写了一封

生气的信给 Mueller。Mueller 在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下，把明显对我与 Kemp 有利的评价的措辞修改得较模糊。出版后，我写信向 Mueller 说他这种措辞对读者有误导性。他来信承认我的意见正确。因此，在修改后的第二版中，明确地强调 Kemp 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自荐的三篇文章

◎如果我请你向经济学内行的读者推荐你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论文，你会推荐哪一篇呢？如果我请你向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推荐你最重要的文章，你会推荐哪一篇呢？

◎向经济学的内行读者，我会推荐那篇提出综观分析方法的文章 即刚才曾说过的、我在 1980 年在英国的《经济学期刊》上所发表的、把非完全竞争引入宏观经济学的文章。在此文基础上，我 1982 年在英国的《经济学报 (Economica)》上发表文章 进一步发展成为综观分析法 并于 1986 年在专著《综观经济学 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 Analysis, London: Wheatsheaf》中 推广至长期分析、政策上的应用等方面。

对经济学并不熟悉的读者，我会推荐 1988 年在《国际社会科学评议 (Kykkos)》上发表的《经济效率与平等的权利》一文。此文把我“一元就是一元”的第三优理论推广至非经济领域，解释人们之所以在许多半经济或非经济领域 例如教育、保健、政治等 反对经济效益原则的应用，多半是由于人们不了解经济学原理。

越懂得经济学的人，越不反对应用经济效益原则。

例如，对餐馆收取星期六晚餐额外座位费的做法，70% 强的非经济学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在看了这种做法是符合经济效益的高峰定价解释后，还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人数减到 50%。

教授批卷 分数跳升

对于还在修读经济学的学生，我会推荐我第一篇经济学文章。此文于 1965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当时我还未修完本科学位。推论主要是用几何图形，并且很少应用数学，所以经济学三年级左右的本科生都可以看得懂。此文题为《为什么人们要买彩票？——含有风险决策与支出的不可分性》。

1973 年我到牛津大学客座访问时，去约克大学参加研讨会，曾提及我这篇文章。当时的系主任或院长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本科学生，能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可以不必考试，我们可以给他学位。”

当时我在就读的新加坡南洋大学发表此文后，虽然还必须参加大学的考试，但同样的表现，分数明显提高了。尤其是当时教经济的一位教授，当我在一二年级时，他只给我六七十分（60 分刚好及格）。当时全班学生大都知道我是全班经济学最好的学生，不过教授可能不知道，也可能因为我经常逃课或在上课时看课外书而不喜欢我，所以我的分数很低。那篇文章发

表后，我向每位经济学教师赠送一份。之后，我的分数就跳上八十多分的水平。

（《信报财经月刊》1991 年 10 月）

经济数理化趋势显著

黄有光教授谈经济学理论与研究（二）

【杨小凯】

对于福利经济学 很多人以为这门学科专门研究政府的福利开支 例如失业救济金、养老金或社会福利等，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远不只此！

⊙杨小凯 ●黄有光

⊙有些人认为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关 因而认为福利经济学家都是主张国家干预 搞福利国家。你对这种偏见有什么解释？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福利经济学”以为是专门研究政府的福利支出 如失业救济金、养老金 的经济学。有些经济学者认为福利经济学理论性很强，就说它与政府的福利开支毫无关系。这两种看法都不对。福利经济学研究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社会福利的高低 而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函数。

福利哲学与平等价值

福利开支影响个人福利 跟效益 激励 与平等两方面的平衡有关，当然也与福利经济学有关。福利经济学的一些结论 有助于决定福利开支的多寡等 但福利经济学并不是专门研究福利开支。其实，如果我们同意 任何政府开支与经济政策 都应该以社会福利为依归，则福利经济学应该是任何政府开支与所有经济政策的基础。例如一切重大项目的进行，都应经过成本一效益分析的鉴定 而成本一效益分析 必须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因此，经济学者非弄通福利经济学不可。

◎经济学界和大学经济系目前在应用数学的水平方面 似乎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诺贝尔奖得主德布鲁不久前，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致辞时，特别强调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他指出，¹³ 所长春藤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入学，都要通过一个高等数学考试。他还认为，数学头脑 (Mathematical sophistication) 的复杂程度，是今天衡量经济学家能力的重要标准。中国大陆留美经济学博士生中，目前得到长春藤大学教职的几位 都是数学系出身。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很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只用几何图形 很少用微积分或更高深的数学工具。因为经济学有很长时间只用简单图形的传统，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且有不欢迎数学化的倾向 学生们也抱怨 课堂上所学的数学水平与看懂期刊上文章所需的数学水平差距太大，你对这

些冲突、转折期中出现的问题及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数理化的趋势明显

●是的，经济是越来越数理化了。当几何图形初用来做经济分析时，被认为是数理化的经济分析。现在用图形分析是属于“不数理化”了。如果图形也不用，则教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也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经济学专业期刊，几乎每家都早已被数学方程式攻占了。

最近有一个集会，让物理学者与经济学者有机会一起对话。结果他们都对对方的数学水平大感惊奇：物理学者惊奇地发现，经济学者竟懂得很高深的数学方法；经济学者惊奇地发现，物理学者的数学知识是那么地不足称道^①。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经济学本科生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有很大的畏惧。许多大学，包括我们莫纳石大学，在一二年级经济课程中，尽量少用图形以外的数学分析，以符合学生们的要求。那些有意深造的，应该修读你所教授的“数理经济学”之类的三年级课程。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大概是属于中庸派。在我自己的文章中，如果不必用高深数学就能推出结论，一般我就不用高深数学有助于推论，或有助于提高一般性与严密性，我使用高深数学。我认为，如果一样能得出结论，为何不用更多人能看得懂的简单非数理方法呢？不过，有时专业期刊的审稿人对非数理的推论较

^① 见《经济透视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0春季，198页；或《科学(Science)》，1989年8月18日，700~703页。